

何顿——著

Resister

抵抗者

在时代洪流面前，
我们都是命运的抵抗者！



抵抗者



何顿 /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抵抗者 / 何顿著. --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17.6

ISBN 978-7-5500-2266-9

I . ①抵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8292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：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E-mail bhzwy0791@163.com

书 名 抵抗者

作 者 何 顿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一 航

责任编辑 苏双鸽

特约编辑 康天毅

助理编辑 马 可

封面设计 金 山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2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24.5

字 数 426千字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266-9

定 价 45.00元

赣版权登字：05-2017-195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序

被遗忘的抵抗者

抗日战争是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。日本人在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也没被他们好好认识，真是让人感慨，嘘唏。思考片刻，原因很多，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比较宽容，而宽容就容易走向健忘。大概中国人都不愿意回想那段残酷和可怕，甚至令人说起来都齿冷的历史吧。而如今，精神和思想方面的东西越来越被大众忽略，代表财富和物质的东西却以其强大的攻势占领了精神领域，致使没有人再去思考过去及昨天的伤痛，想的都是未来，展望的都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，而过好生活当然需要好的东西。拥有好的东西成了中国人的话题，都像着了魔一样。什么都想占有最好的，好房子、好车、好女人或好男人。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，而身为国人的广大老百姓都想摆脱多年来困扰着我们的贫困，赶到前面去。战败后的日本由于没搞政治运动，又有美国支持，工业比中国发展快。二十多年前，中国人都以拥有日本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等而自鸣得意，假如你还拥有一辆日本小车，那屁股都翘上天了。

中国人健忘。

中国人从不痛定思痛。

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很少。

但也有人说，民族情结是狭隘的。

什么是不狭隘的呢？这个问题很复杂，我相信没有人能说清楚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晓得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。教室里，老师跟我们讲解南京大屠杀，讲解“九一八”和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卢沟桥事变，讲国民党军队拒不抗日、节节败退等。那时候，我很困惑。既然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了三十万炎黄子孙，为什么炎黄子孙的军队却拒不打击侵略军？为什么不拼死抵抗而节节败退呢？后来长大了，听省参事室的国民党老兵说，不是中国军队不抗日，而是日本军队实在太厉害了，装备太好了，想打也打不赢。这话我愿意接受，打不赢就撤，打不赢还硬拼，那是送死。都死了，谁去打日本人？

小时候还听说日本兵曾四次进攻长沙，前三次被长沙守军击退，第四次由于张德能将军的轻敌和指挥失误，致使日本侵略军攻克长沙城。那是一九四四年，即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前一年。后来我下乡当知青，在农村里听说日本兵到过我下乡的那个村子，并在那个村子里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多名。农民于歇工时讲的日本兵进入村子的故事里，有两个细节留在我心里多年却怎么也挥之不去。一个是说日本兵不呷死猪肉，他们捉住猪捆起来，割下活猪的腿肉烧着吃；另一个细节是说日本兵强奸了妇女后，还割下了那名妇女的一对乳房扔在地上。在我下乡的那个村子里有一名抗日英雄，村里人告诉我，他杀死过两名日本兵。那名抗日英雄是个农民，我下乡时他六十来岁，脸黑黑的，与其他农民没什么两样，只是感觉上很结实。村里人说他会武功。那时候，我常常将崇敬的目光投向他，觉得他不是电影里日本兵瞧不起的“东亚病夫”，更不是令我们一百个鄙夷的汉奸。

大学毕业后我结了婚，去常德看岳父岳母。我岳父跟我提及了常德会战，我最开始是从他那里晓得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和余程万师长。岳父告诉我，一个师，六千多名国军官兵把几万日本兵打得很恼火。日本军队想在三天内消灭这个师，结果用了十九天，而且还动用了大量的飞机、野炮、重炮和毒气弹。我当时就想这是民族的东西了，是一种民族的精髓或者叫作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这六千多名官兵，致使他们顽强抵抗，将生命献给了家乡这片炽热的土地。

我构思写这部抗战小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长沙天心阁茶楼里认识了一位前国民党老兵，他参加过著名的衡阳保卫战，而他参战时只有十七岁，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。他告诉我他们那一批中学生于一九四四年开春时大多入了伍，为的是打击来犯的日本侵略军。我很感动，想

写，但心里没底，好像材料准备得还不够充分。隔了些年，又认识了一些前国民党老兵的后裔，继而也认识了那些老战士。那些老战士都有一个共同情结：恨日本人。他们讨厌日本人，讨厌日本货，阻止家里人买日本电器。他们谈论起抗日战争，脸上都有一种不愿回忆的痛苦，那些痛苦感觉像蚂蚁一样在脸上爬着，我甚至想走上去把那些蚂蚁一只只拈掉。这些事情于那几年里常常于有意无意中涌入我的脑海，不断地敲打着我的脑壁，致使脑海里一片呐喊声，甚至枪声、炮声也涌入了我的梦中，最后我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，写了这部长篇小说。

我要强调一点，我写它时，把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春末的湖南南县的厂窑大屠杀，推后了几个月，这是为了便于集中起来一并叙述。厂窑大屠杀是很残忍的，是日本侵略军在湖南境内犯下的又一个滔天罪行，杀死了三万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我写小说从来不掉泪，眼泪仿佛与我无缘，但当我写到厂窑大屠杀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时，我那久违了的泪水涌现了，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夺眶而出，掉落在我颤抖的手和冰冷的键盘上。

这本书里，有些情节看上去很荒诞，离谱，好像不可能，但却是发生过的事。这个世界上，没什么事情不可能。老实说，我写这本书，既不是讨好当下政府，也没打算讨好远在台湾的国民党，而是觉得老一辈人很了不起，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孱弱和自己最无奈的时候，付出了很多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。

我在小说开篇之际，还得交代几句，以免只有传统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生气。本小说与众多传统小说不同，时间是打乱的，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也许会放在后面，发生在后面的事情因为需要，又放在了中间或前面。我敬请诸位读者注意一下年月日，只要你心里对年月日有数，你就不难理清头绪。我曾经想按时间的顺序写，但那样的话，也许要写一百万字，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，只好把时间提来拎去，便于长话短说。

目录
CONTENTS

序	被遗忘的抵抗者 ...	001
第一章 – 梦回黄家镇 ... 001		
第二章 – 李香桃老师自杀了 ... 008		
第三章 – 老爹成了“叛徒” ... 016		
第四章 – 坚守安乡 ... 025		
第五章 – “败类” 黄抗日 ... 042		
第六章 – 假装死人逃过一劫 ... 056		
第七章 – 被日军俘虏 ... 068		
第八章 – 叛徒甫志高你往哪里跑 ... 076		
第九章 – 再也不用装疯了 ... 094		
第十章 – 现在还不能死 ... 108		
第十一章 – 五十七师都是好汉 ... 128		
第十二章 – 鲶夫黄抗日 ... 148		
第十三章 – 常德会战 ... 163		
第十四章 – 被游击队俘虏 ... 181		
第十五章 – 苦中作乐 ... 200		

目 录
CONTENTS

第十六章 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...	223
第十七章 – 攻打彭家大屋 ...	242
第十八章 – 田矮子成了排长 ...	252
第十九章 – 与死神打了个照面 ...	259
第二十章 – 兵临城下 ...	271
第二十一章 – 一生中的政治事件 ...	280
第二十二章 – 衡阳保卫战 ...	286
第二十三章 – 唯一一次受伤 ...	304
第二十四章 – 来生再见 ...	318
第二十五章 – 幸存者 ...	343
第二十六章 – 命运的抵抗者 ...	357

第一章 - 梦回黄家镇

我爹快九十岁了，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。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耶稣诞生在马厩里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几天后他复活了，成了基督。书上是这么说的，不信也不行。后来这一天被基督徒定为圣诞节。有一首唱耶稣降生尘世的歌，名叫《平安夜》，很多人都会唱。有一天我因事去教堂找一朋友，无意中撞见许多穿着白衣黑裤的中年男女排成三行，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前（耶稣被聚光灯照着，一副令人伤痛的悲惨相）合唱这首歌，我蓦地感到，有的人唱这首歌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神圣，仿佛被来自远古时代的圣光神秘地爱抚着。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是这样的：

平安夜 圣善夜 / 神子爱 光皎洁 / 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 / 圣容发出来荣光
普照 / 耶稣我主降生 / 耶稣我主降生

我爹的生日就是圣诞节，所以我也会唱这首歌。

二十世纪，中国社会进入九十年代后，中国人受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，年轻人基本上过起了圣诞节，不过圣诞节的年轻人，仿佛就是思想僵化的人，所以西方的圣诞节、情人节，成了年轻人喜欢的节日。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，从下午起到半夜，我的手机总会响很多次，总能收到很多条信息，都是祝“圣诞快乐”的，这一条条信息都会让我想起第二天是耶稣的生日，也是我爹的生日，我便会想明天怎么给爹过生日。多年前，爹对过生日很不习惯，总是说：“过什么生日？不过，我不过。”

但不过也没用，这一天是圣诞节，耶稣降生了，虽然我和妻子、儿子都不

是基督徒，但大家都在给耶稣过生日，宾馆里、酒店里，甚至一些大学生都在给耶稣过生日，即使那天我假装忘记了，姐也会打电话说：“小毛，今天是爸爸生日，我们在哪过？”

我会说：“是啊，那我们去哪吃饭吧，你顺便买个生日蛋糕。”

姐会衣着讲究地拎个生日蛋糕来，吃完饭后，生日蛋糕便会摆到桌上，关了灯，点燃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，看着爹开心地拍着手，边唱道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／祝你生日快乐／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

这种家庭活动，每年要搞一次，都是圣诞节这天。

我爹的一生是这样的：他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南白水县黄家镇。二十岁那年，他应征入伍，参加了长沙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会战。五年后被日军俘获，成了日军的力夫，为日军搬运炮弹——那是发生在湖南境内的常德会战期间，后来被收复失城的国军官兵解救。半年后再次被日军俘虏，那是于著名的衡阳保卫战结束时，他与他的弟兄们在团长的指示下一起向日军举起了软弱无力的双手，当时他们饿得要死，几天没吃一粒米，喝的是阴沟水，都没打算活下去了。当时我爹的军衔乃排长，休整后被编入伪军。几个月后又被湘南游击队捉拿，于是弃暗投明，成了游击队员。五年后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逮捕，关在黄家镇乡公所，关了五天。五天后，一支去攻打白水县城的游击队，折回来解放了黄家镇。我爹再次获得自由。我爹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，然而却顺利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，这证明他确实命大。我爹从二十岁从军至三十一岁放下枪杆子的人生经历里，参加过近百次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战役或战斗，却只是在我以后将说到的槐树店负了一次伤，这证明我爹于冥冥之中是受上帝关照的。

爹于去年满了八十九岁，现在正往九十岁挺进，虽然今天的中国发展了，老百姓不用再愁吃穿，看病也有医保，但能活到我爹这个年纪的老人，仍然不是很多。我爹不能说仍很健康，但还活着。爹比我大四十岁，我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，这一天离他满四十岁生日只差十七天。我大哥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，那一天正好是国际儿童节，全世界的儿童正在欢庆节日。我爹在我大哥一岁零三个多月大时，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天，由于他极度思念从未谋面的儿子，便不顾组织上的约束，偷偷跑回家看儿子——我大哥，而被国民党地方治安队捉拿了。我大哥如今在北京工作，在一家研究所当副所长，那是一家厅级单位，所以他官至副厅级。但是在首都北京，官至副厅级的干部太多了，

也就没什么好骄傲的。我大哥和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。他母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患肺病吐血而亡。我和姐共一个母亲，姐比我大三岁。

我和姐都是我爹续弦的女人所生。我们的母亲也死了，死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死时不到四十岁。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投河自杀。那是一九六九年初夏发生的事情，当时我还只十岁半，而我姐姐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姑娘。我那个从小就很少会读书且接连跳两级的大哥，当时二十一岁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前一年考进了北京大学，但大学尚未毕业就被赶到了北大荒那片冻土上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当时爹已神经错乱，不晓得自己有老婆、儿子和女儿，面对我母亲的遗像，他奇怪地瞪大眼睛，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：“这个人感觉好面熟。”

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，说：“爸爸，她是我妈妈李香桃。”

爹不明白地望着我，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，“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？”

我说：“爸，你说什么呀？妈妈是跳河自杀。”

爹就咧开扁嘴大笑，不相信的样子道：“我妈早作古了。”

由此读者又得到一条信息，我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疯过。造反派说我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，又是汉奸，还是叛徒。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忽然有一天他就精神崩溃了，不晓得自己生活在哪个年代，看见整他的造反派雄赳赳地走进来，目光那么凶，像尖刀一样刺着他，他忙一副中毒的样子倒下，摁着胸膛，装死，或一本正经地跑到窗口喊叫“日本鬼子来了，日本鬼子来了”。这种视革命造反派为日本鬼子的行径，弄得造反派们既莫名其妙又大为恼火，觉得受了我爹的挑衅和侮辱，就边用脚踢我爹，边冲他吼叫：“谁是他娘的日本鬼子，你说？”我爹惊惧地看着他们，想逃，但背后是坚固的墙，前面是气势汹汹的造反派，就绝望地蹲下身，缩成一团，形似一只害怕挨揍的大猩猩，抱着头呻吟道：“日本鬼子来了，日本鬼子来了。”

他们起先认为我爹是装疯，以此蒙混过关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黄抗日这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坏人，是不可能疯的，便凶道：“别装了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？国民党特务的这些小把戏早在我们的掌控之中，你只能骗自己，骗不了我们！”爹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，缩成一团，哆嗦着。那些人讥讽我爹道：“喂，你是看了《红岩》吧？你想学电影里的华子良？你这德行，怎么学得像我们共产党？坏人就是坏人。”

《红岩》那部革命斗争小说里，华子良为了牢友们的需要，在监狱里装疯。

那个时候的人都读过这部小说，都晓得华子良装疯，以此麻痹敌人，好在混淆视线中从事地下活动。我十几岁时也读过，我爹没读过，他不看小说。但是没有一个装疯的人会搓自己的粪便，并将粪便搓成条状吃掉。他们把我爹放了，因为我爹吃自己的屎。他们感到很失望，纷纷摇头，鄙视地说：“猪狗都不吃自己的屎。”那意思是我爹连猪狗都不如，这样的人再关着，实在是浪费国家的人力、财力，也是侮辱他们的智慧。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进我家，虎着脸把我和我姐叫到关着我爹的房前，打开门，对我和我姐说：“你们把他带回去。”

姐叫道：“爸爸。”

爹头也不抬。

我唤了声：“爸爸。”

爹照样埋着头，好像没听见我和姐叫他。姐走过去拉他，爹蓦地抬头，大张着嘴痴笑，一副突然醒过神来的样子，紧张着脸，左右觑一眼，睨着我姐说：“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到处都是日本兵呢，快跑呀姑娘，日本兵是什么人都杀的。”

那是一九六九年。

爹现在住在我家。此前，爹被我大哥接到北京住了三个月，但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。北京气候干燥，不像南方湿润。爹住在北京的那三个月，先是手上的皮肤开裂，接着脸上的皮肤也开裂成一条条缝，就像树皮裂开一样，接下来身上的皮肤也裂开了，露出粉红色的肉。于是大哥把爹送回了南方。爹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，所有开裂的皮肤全愈合如初了。这是南方的空气湿气大，湿气对保护皮肤很有好处。爹只适合在他生长的南方生活。大哥十七岁就去了北方，已适应了北方气候，因此皮肤不开裂。

爹在两年前，还是个正常老人，能吃能睡，不吵事，也不跟我或我姐纠缠。吃过饭，他会拿张报纸，坐在梨木太师椅上或桌前，戴上老花眼镜，看《人民日报》或《湖南日报》，从头读到尾，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，看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新政策。往往要我催他睡觉，他才如梦方醒的样子弃下报纸，走进卧室躺下。但他的生命向九十岁这道大关迈进的近两年里，人返老还童了，动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觉得自己很孤独，觉得我们不关心他，还觉得自己很委屈。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”爹哭着对我说，“我不想住在你这里了，我要回家。”

“这就是你家，”我对爹说，“你没别的家了。”

“这不是我的家，这是你家。”爹分得很清。

“我家就是你的家，爸爸。”

“我要回黄家镇。”爹哭巴巴地指明道。

“回黄家镇干什么？”

爹说：“回黄家镇住。”

爹在黄家镇有一套两室一厅房，那是镇政府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建的，爹是离休干部，自然也分了一套。早些年爹就住在那套两室一厅房里，一个人住着，一个人做饭吃。但他不搞卫生，家里肮兮兮的，厨房里油渍渍的，弄得同邋里邋遢的狗窝一样。结果他在自己的厨房里摔了一跤，中了风，在地上睡了半天。要不是他的邻居——一个比他年轻的老头跑来找他下象棋，发现他躺在厨房的地面上话都说不出，慌忙叫人把他送进镇医院抢救——那他在八十岁那年就已经见阎王了。但阎王爷那天还不想要他，派那个年轻点的老头来救了他的命。我和姐把爹接回长沙治病，总算把爹从死亡的谷底拉了上来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让他只身回黄家镇住了。他这样的年龄，再摔一跤，恐怕就直接与阎王老子对话了。

“小毛，我要回黄家镇。”吃饭时，爹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

我的小名叫小毛。我的大名叫黄跃进，我是“大跃进”那年生的。我的名字上打着时代的烙印。我用困惑的口气说：“你怎么又要回黄家镇？”

爹说：“小毛，我住在你这里同坐牢一样。”

“同坐牢一样？”

爹感到说错了话似的低下头。

“你有吃有穿，既不要你做饭又不要你干其他家务，还坐牢一样？”

爹说：“你们一上班，我一个人，连说话的人都没一个。”

“你可以看电视，还可以听音乐，家里有唱花鼓戏的DVD，你可以随便听呀。”

“听厌了。”

“那就看看电视。”

爹回答：“电视不好看。”

“那你要看什么呢？”

“我还是想回黄家镇，”爹说，“我不想住在你这里。”

我住着一套三室两厅两卫房，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花几十万买的，楼层为七楼，顶层，但没电梯。我买它，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锻炼身体，

上楼、下楼都得依赖两条腿，回家爬爬楼，这就是锻炼。我爹却无法出门。七层楼的上下，对于某些健康的老人来说都很吃力，对于我爹就更加要命。爹快九十岁了，人老得有些古怪了，思想也天上地下了，假如他下了楼，就得用很长时间上楼，要不就是我把爹背上来。爹为了不麻烦我，就尽量不下楼，想晒太阳就站在阳台上，伸出头去迎接阳光，否则他就没法晒到太阳。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场所非常狭窄，犹如坐牢一般，白天又没人来，即使有人来，也不是找他的，打电话找人聊天又没人聊——他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死了，活着的几个彼此都不关心了，而且打电话聊天，爹又舍不得，觉得说两句话都要钱，是浪费钱。我姐住五楼，住的是复式结构，有电梯。但爹思想封建，认为女儿嫁人了就是别人家的人，他住到女儿那里等于是住在别人家里。他可不愿意麻烦“别人”。我打电话把姐叫来了，爹总是吵着要回去，好像是我束缚了爹的人身自由。如果要送爹回去，也得征求姐的意见。姐是医生，我问她：“爸这样子回去行吗？”

“绝对不行。”姐尖声说。

爹坐在沙发上，蜷缩成一团，犹如一个被伤害的老人，偷偷地看着我和姐。

我说：“爸总是说他要回黄家镇，我都烦了。”

姐说：“你看爸爸这样子，还能一个人做饭吃？”

“不能，可以给他请一个保姆。”

“保姆会照顾爸爸拉屎拉尿？爸爸经常小便失禁，保姆会给他洗尿裤？”

姐说的是事实，这两年，爸爸经常小便失禁，要解小便了，突然就急慌了神，往卫生间走的几步中，往往还没来得及解裤扣，尿就迫不及待地出来了，尿湿了裤子。而且他又要面子，你说他尿湿了裤子，他会否认。我明明看见他的裤裆或裤扣边湿了一块，要他把裤子换了，他竟不愿意换，说“不换，等下就干了”。这种状态，当然不能让他一个人单独生活。我说：“爸爸整天说他要回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我姐精干，但脾气较大。她的面相有些像我记忆中的母亲。她是内科医生，早几年评了教授，还出过两次国，所以讲话大声大气的，一副见了世面的样子。她冲缩在沙发上的爹没好气地说：“爸爸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动不动就用回去威胁我们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都要工作，你回去了哪个管你的死活？！”

爹以惧怕的样子瞪着我姐，就像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老猩猩。

姐咳嗽声，脸上有些愠色，又说：“你回黄家镇有什么好？你那一辈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还有几个人会理你和找你？你想错了，爸爸。”

爹仍是用那种表情瞪着姐。

姐生气地说：“黄家镇哪里好？一个我都不愿意回去看一眼的地方，我们还没受够？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你还没吃够亏？我坚决不赞成你回黄家镇。”

爹憋着脸，看着说话干脆、坚决的姐。

姐又说：“住在这里多好！吃饭、洗衣都不要自己动手，卫生也不要搞，这多舒服？小毛这样孝顺你，你还不满足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，你说？”

爹仍是那种害怕什么的老猩猩神态，不敢插嘴，垂下了他那张皮打褶的脸。

姐说：“爸爸，你太不像话了。”

姐有训斥病人的毛病，凡是让她烦躁的人，她一律将其视为病人。姐在病房里就是以恶著称，病人及病人的家属都有点怕她，晓得我姐训起人来总是把人不当作人训，指出生死要害，一点也不留情面。姐还不甘休，继续教训道：“爸爸，以后你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了，真的把你送回去，死了我们就不负责任。”

姐讲狠话道：“反正我这辈子是不会回黄家镇了，要去你去。”

爹以认错的模样回答：“好了，我不说这样的话了。”

“你过两天又会说，”姐驳斥爹说，“小毛都烦了，我耳朵都听出茧了。”

爹迷茫地张大嘴道：“我过两天又会说吗？”

“你要记住你说的话，我不想再听小毛打电话说你吵着要回黄家镇。”

爹惭愧地低下头，想让自己镇静，清醒，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话，思维和交流，以免儿子、女儿冲他发火，但他那头发花白的脑袋里，总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让他迷惑。爹看着我姐，拼命回想着什么，临了问：“你是李香桃吗？”

爹又犯迷糊了，他把自己的女儿认成了我母亲——他的亡妻李香桃老师。

第二章 - 李香桃老师自杀了

李香桃是我母亲，一位小学老师，生前在黄家镇迎春路小学教书，我大哥、我姐和我都做过母亲的学生。李香桃老师如果还在世的话，也有七十七岁了。近四十年前，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初夏，李香桃老师对自己一狠心，投河自杀了。所以母亲留在我和姐心里的形象，永远是年轻的，但不漂亮。我母亲不漂亮，如果漂亮也轮不到长相像猩猩的我爹娶她。我母亲个儿矮，还很瘦，长一张阴麻子脸，二十三岁时嫁给了我爹，当时爹已三十五岁，那是一九五四年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黄家镇，二十三岁的女人还没找到婆家，就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。那个时候姑娘们十六七岁就结婚了，有的姑娘只十四岁就嫁了人。两人经迎春路小学女校长介绍认识，见了三次面，就于那年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天结婚了。一年后生下了我姐，隔了三年，生下了我。我和姐都出生在黄家镇医院。

我母亲李香桃是个严厉的女人，关于她的严厉是怎么形成的，也许是天生的，也许是她当老师的缘故。留在我记忆里的母亲，不但严厉，而且好胜，什么事情她都要在学校里争第一，这种性格的女人竟然自杀了，真是匪夷所思。我曾问过一个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笑笑说：“像你母亲这种性格的女人，最容易自杀。”

我问：“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了，去跳河自杀？”

心理医生回答我：“因为她觉得自己输了，她最看重的是输赢，她输不起。”

最看重输赢的李香桃老师，为达到争第一的目的，不严厉也不行。于是我母亲对学生绷着面孔，为的是让学生别懒惰，别以为可以不做作业，别以为上课可以讲小话或做小动作。李香桃老师手中的教鞭可不是摆摆样子的，谁敢不

做作业她就打谁的手板。脾气来了还打学生的脑袋。李香桃老师打人从不含糊，任何一只手在她的教鞭下总要起一条条红印，这也是让一些学生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报复她的原因。他们把几根牛筋绳绞在一起，弄得很粗，用它来抽打李香桃老师。他们不但要把挨李香桃老师打的次数都夺回来，还想赚那么几下。

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充满报复欲望的哥哥姐姐抽打我母亲，虽然恨得咬牙切齿的，却只能以沉默对抗。

身为小学教师的我的母亲，不只是对学生严厉，对我和姐也很严厉，她脸上很少有笑容，说话闷声闷气，以此树立严母形象。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，但她知道孟母教子，三迁其家，因而她用孟母要求孟子的一切来变本加厉地要求我们，动辄就叫我把手伸出来，打手板。假如我抵触，不愿伸出手，她手中的教鞭就可能更猛烈地落在我的脚或屁股上。如果是冬天，我还能占点便宜，因为裤子穿得厚，绒裤和棉裤，加罩裤，能很好地消化一部分教鞭落在脚或屁股上的力度。若是夏天，我就吃大亏了，因为母亲会更加狠地打她不听话的儿子。

我母亲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。她若是个男人才理所当然，可惜她是个女人。我和姐在小时候不怕爹，爹在我们眼里性情温和，很少对我们发脾气。但我和姐都怕母亲，她不跟我们说二话，要打，教鞭就下来了，要骂，什么凶狠的话都可以从她嘴里飙出来。诸如“你这个砍脑壳的”“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”等等。

李香桃老师心性高傲，于是有一百个理由认为自己劳苦功高，在我们小时候，一家四口人的衣裤都是李香桃老师洗，一家四口人的饭菜也是李香桃老师操劳。爹在我出生前是镇供销社副主任，一个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的副主任。主任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主任觉得不重要的会议均让副主任顶替。于是爹很少在家待着，常常几天不回家，一问，才晓得爹到县供销社调货去了。那时候湖南的工业相当落后，所有的货物都是紧俏物质，例如单车、手表、收音机等，甚至糖果、饼干也是紧俏物质。如果你不守在县供销社等，那么这些商品就可能永远不会光顾黄家镇供销社。我爹身为供销社副主任，就是负责此项工作。爹责任心强，不愿看见供销社的柜台上空空荡荡，又不放心他领导的那个年轻小伙子，就只好什么事情都亲自出马。当然一出马就是一天、两天，甚至三天不归家。

那是一个让我爹那辈人工作起来勤勤恳恳且不顾妻室儿女的年代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爹很少在家待着，星期天也是吃过早饭就不见人了。母亲说他把这个家当成了旅社，爹却不吭声。爹不是个能言善辩之人，也没当